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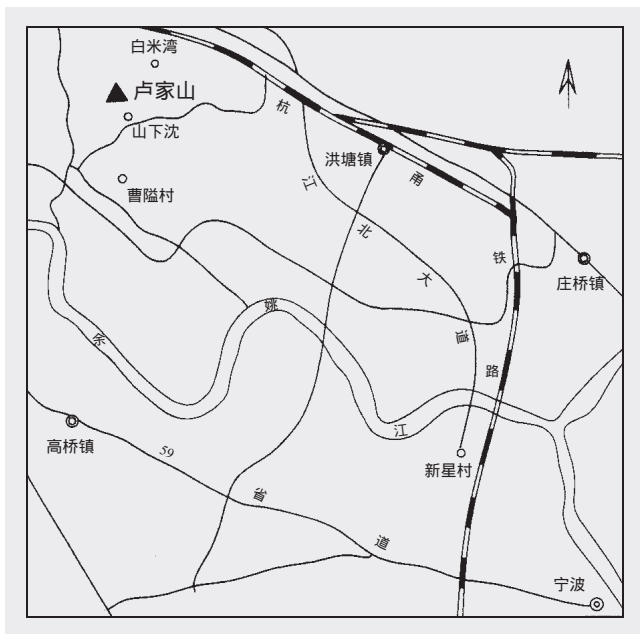
# 浙江宁波洪塘卢家山商周遗存发掘报告

◆ 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为配合宁波绕城高速公路(西段)工程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路线所经江北区洪塘镇山下沈村西北之卢家山南端山体部分及其东侧农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编号2004HL),清理了一批六朝时期的砖室墓葬<sup>①</sup>和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图一;彩版二,1)。现将有关商周文化遗存发掘情况作一简要报告。

## 一、墓葬

商周墓葬大多分布于卢家山向西南方向延伸的山脊上,少数分布在其西南侧山坡地带,所处海拔均在20米以上,最高海拔35米左右。共计发现土墩石室墓5座、土墩1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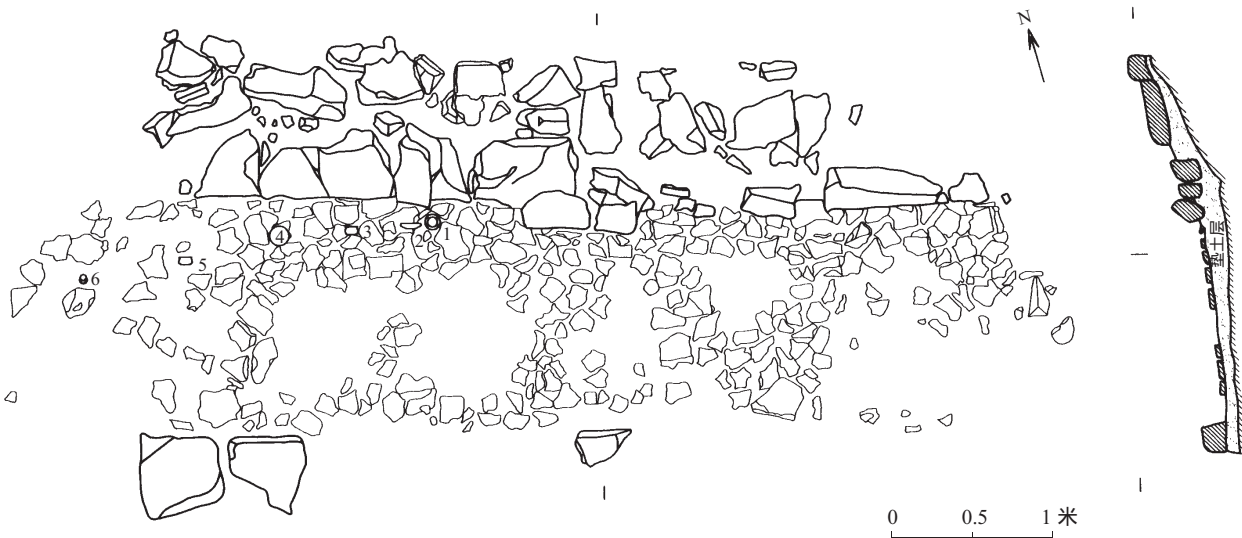
图一 卢家山商周遗存位置示意图

## 1. 形制结构

石室土墩墓5座。因与同时发掘的六朝墓葬统一编号,5座土墩石室墓分别编号为M4、M7、M8、M9和M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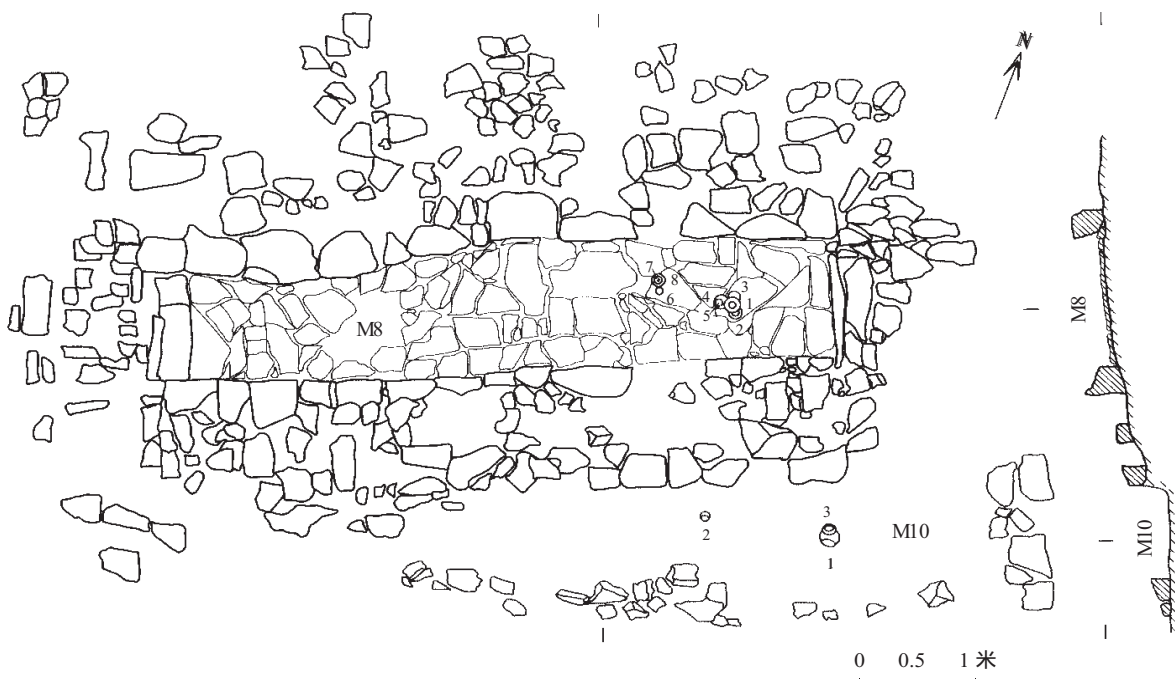
M4:墓底距地表约0.8米,封土及墓室上部已毁,仅余局部石砌墓底和残存的两侧墓壁。墓室平面狭长条形,方向105°,残长5.3、宽约1.45、残高0.15~0.4米不等。墓底以大小不一的石块单层铺垫,石缝较大。墓东侧壁用较大的块石叠砌,西侧壁仅存石块三块。随葬器物共6件,包括原始瓷碗1件、钵2件、盅3件,均置于墓室右前端(图二)。

M8:墓底距地表约0.65米,封土及墓室上部已毁,墓室下壁及墓底保存较好。墓室



图二 M4 平剖面图

1、2. 钵 3、5、6. 盅 4. 碗



图三 M8、M10 平剖面图 M8:1~6、8. 碗 7. 器盖 M10: 1. 甌 2. 罐 3. 碗

平面狭长条形,方向 $70^{\circ}$ ,长5.55、宽0.85~1.2、残高0.4米。墓底以大小不一的薄石板单层铺垫,石缝较大。墓两侧壁和后壁用较大的块石叠砌,内壁较平整,前壁用一块长条形石板侧砌封门。墓室四周乱石堆砌加固。随葬器物共8件,包括原始瓷盂式碗7件、器盖1件,均置于墓室前端(图三;彩版二,2)。

M10:墓底距地表约0.85米,封土及墓室上部毁坏严重,北侧壁被M8打破,仅存墓室前壁和南壁局部。墓室平面长条形,方向 $80^{\circ}$ ,残长5.05、残宽约1.42、残高约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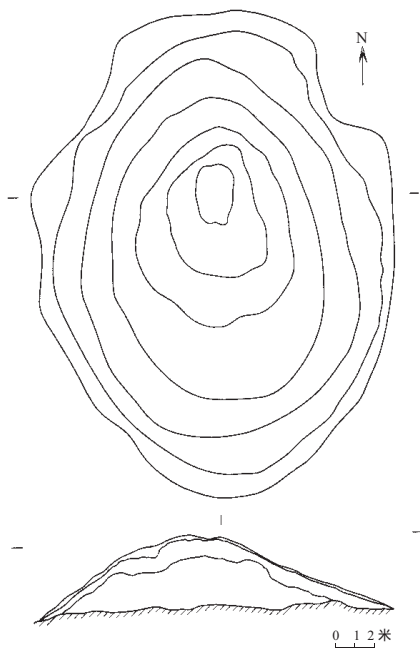


图照一 D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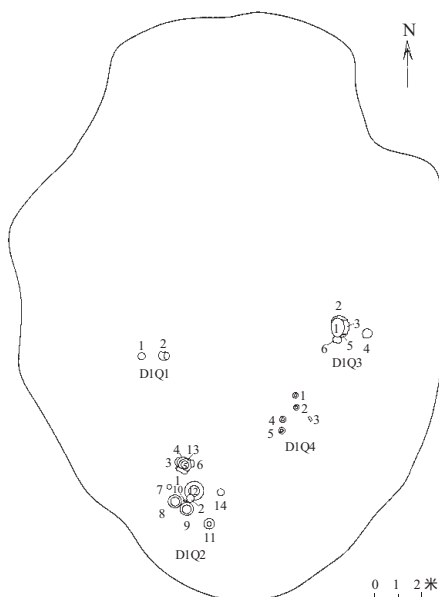
米。墓底略做平整,未见铺垫石床。墓壁块石垒砌。随葬器物共3件,包括原始瓷碗1件、罐1件、印纹硬陶甌1件,均置于墓室前部(图三)。

M7和M9叠压于现代表土之下,损毁严重,结构难辨。墓底均系直接利用山岩构筑,出土器物亦散落于山岩各处。其中M7出土器物共13件,包括原始瓷豆10件、钵1件、碗2件;M9出土器物共29件,包括原始瓷豆17件、钵9件、盂1件、罐1件、泥质陶炉1件。

土墩1座,编号D1。位于卢家山山顶,墩体保存较好,隆起明显,平面近似扁圆形,南北长25.3、东西宽18.6、高4.4米(图照一)。封土堆积可分三层,其中第①层为黄褐色表土,厚0~60厘米;第②层为带铁锈斑的灰褐色土,土质较致密,颗粒较粗,夹杂石子,厚35~120厘米;第③层为灰黄色土,土质坚硬,内含大量的石块,厚0~265厘米(图四)。封土内共发现成组独立堆放的器物群4组,分别编号为Q1、Q2、Q3和Q4。其中Q1与Q2叠压于第②层封土之下, Q1出土原始瓷罐1件、盂1件, Q2出土原始瓷碗5件、钵2件、盂1件、罐1件、盆1件,印纹硬陶甌3件,泥质陶钵1



图四 D1 封土平剖面图



图五 D1 器物群平面分布示意图

- D1Q1: 1. 罐 2. 盅  
D1Q2: 2, 4, 6, 11. 碗 3, 5, 13. 钵 7. 盅  
8, 9, 12. 甗 10. 盆 14. 罐  
D1Q3: 1, 2, 3. 碗 4, 5. 甗 6. 盅  
D1Q4: 1, 2, 4, 5. 玉块 3. 玉管

件。Q3 与 Q4 叠压于第③层封土之下, Q3 出土原始瓷碗 3 件、盅 1 件, 印纹硬陶甗 2 件, Q4 出土玉块 4 件、玉管 1 件 (图五)。另外, 在 D1 的西北与东侧山体斜坡表土之下, 还采集到一些散落的印纹硬陶器物, 包括瓮 1 件、罐 1 件、甗 3 件。

## 2. 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共计 91 件, 按质地可分为原始青瓷、印纹硬陶、泥质陶和玉器四类。其中原始青瓷 73 件, 器形见有豆、钵、碗、盅、罐、孟、盆、器盖等; 印纹硬陶 11 件, 器形见有罐、瓮和甗; 泥质陶 2 件, 器形见有钵和三足炉; 玉器 5 件, 器形见有玉块和玉管。

### (1) 原始青瓷

豆 27 件。分 A、B、C 三型:

A 型 4 件。敞口, 宽平沿, 浅弧腹, 喇叭形矮豆把。青绿釉, 釉层丰厚浑油, 厚薄不匀, 釉不及底。器表内外均见细密弦纹, 应是慢轮修整痕迹。标本 M7:7: 口径 11.2、底径 6.2、高 3.2 厘米 (图六, 1)。

B 型 10 件。敞口, 圆唇, 折腹, 上腹内弧, 下腹斜收, 喇叭形矮豆把。标本 M7:12: 器形粗糙不规整, 胎釉结合欠佳, 釉厚色深, 剥落较严重。口径 8.8、底径 4.8、高 3.6 厘米 (图六, 2)。

C 型 13 件。折腹, 浅喇叭形矮豆把。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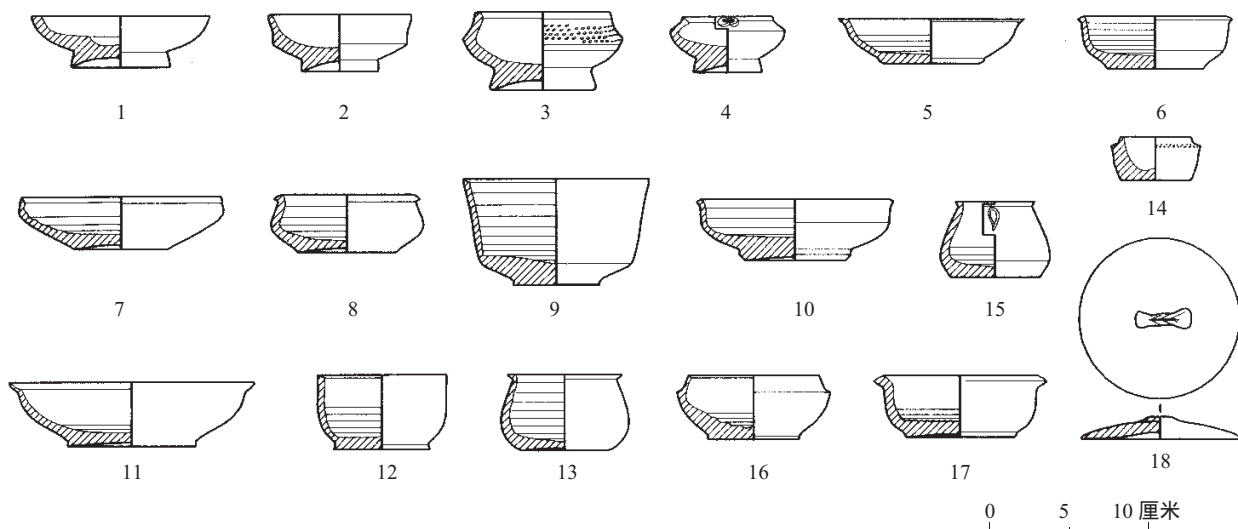
式 10 件。圆唇, 直口微敛, 肩部或贴筑单耳, 或饰戳印纹, 或饰弦纹, 或素面。胎体厚重, 釉层厚薄不匀, 见有滴釉或剥釉现象, 釉不及底。标本 M9:25: 肩部饰戳印纹。口径 8.5、底径 6.5、高 4.9 厘米 (图六, 3; 彩版二, 6)。

式 3 件。敛口, 沿内折, 肩部饰“~”堆贴纹, 胎体厚重, 剥釉严重。标本 M7:3: 肩部贴 3 只“~”形纹。口径 5.6、底径 4.4、高 3.5 厘米 (图六, 4)。

钵 14 件。分 A、B、C 三型:

A 型 5 件。敞口, 平沿, 尖唇外突, 浅弧腹, 平底。内壁螺旋纹。标本 D1Q2:3: 青釉, 剥落严重。口径 11.7、底径 6、高 2.8 厘米 (图六, 5)。

B 型 8 件。口近直, 沿外斜, 尖唇, 直腹近底处弧收, 平底。内壁螺旋纹。青釉不及底。标本 M4:1: 口径 8.8、底径 6、



图六 原始青瓷器物

1. A 型豆 (M7:7) 2. B 型豆 (M7:12) 3. C 式豆 (M9:25) 4. C 式豆 (M7:3) 5. A 型钵 (D1Q2:3) 6. B 型钵 (M4:1)  
7. C 型钵 (M4:2) 8. A 式碗 (M10:3) 9. A 式碗 (M8:2) 10. A 式碗 (M4:4) 11. B 型碗 (D1Q3:3) 12. A 型盅 (D1Q3:6)  
13. B 型盅 (M4:3) 14. A 型罐 (M9:24) 15. B 型罐 (D1Q1:1) 16. 孟 (M9:12) 17. 盆 (D1Q2:10) 18. 器盖 (M8:7)

高3.3厘米(图六,6)。

C型 1件。敛口,尖唇,上腹外鼓,下腹斜收,平底微内凹。器形规整匀称,内壁饰螺旋纹。满施青釉。标本M4:2:口径12.8、底径5.8、高3.3厘米(图六,7)。

碗 19件。分A、B两型:

A型 14件。盅式碗,分三式:

式 6件。直口,沿外斜,尖唇,垂鼓腹,近底处向内弧收,平底微内凹。内壁螺旋纹。标本M10:3。器身满施青釉。口径8、底径6.2、高3.6厘米(图六,8)。

式 7件。直口,沿内斜,直腹微内斜,近底处折收成假圈足或平底。内壁螺旋纹。釉多剥落。标本M8:2。假圈足底。口径11.6、底径5.4、高6.6厘米(图六,9;彩版二,7)。

式 1件。口微敞,沿外斜,直腹,近底处向内弧收,假圈足。内壁螺旋纹。标本M4:4:口径12.4、底径7、高3.8厘米(图六,10)。

B型 5件。敞口,沿内凹,弧腹,假圈足。外底粘有砂粒,内底螺旋纹。胎体厚重,施青釉或青绿釉,釉不及底,有滴釉现象。标本D1Q3:3:口径15.3、底径8、高4厘米(图六,11)。

盅 6件。分A、B两型:

A型 1件。直口,平沿内斜,直腹,近底处向内弧收成假圈足。内壁螺旋纹。满施青釉。标本D1Q3:6:口径8.1、底径6.5、高4.6厘米(图六,12)。

B型 5件。直口微敛,平沿,尖唇外突,直腹外斜,近底处向内弧收,平底微内凹。内壁螺旋纹。标本M4:3。器形较规整,釉已剥落。口径7.2、底径5.5、高4.7厘米(图六,13;彩版二,8)。

罐 4件。分A、B两型:

A型 1件。直口,圆唇,折肩,腹略斜收,平底。肩部戳印纹。青绿釉不及底。标本M9:24:口径4.3、底径4.3、高2.7厘米(图六,14)。

B型 3件。直口,平沿,尖唇外突,双立耳,腹外斜,近底处向内弧收,平底。内壁螺旋纹。施青釉不及底。标本

D1Q1:1:口径4.9、底径5.6、高4.7厘米(图六,15)。

盂 1件。敛口,沿内弧,折肩,弧腹,平底微内凹。内壁螺旋纹。满施青绿釉。标本M9:12:口径8.2、底径5.6、高4厘米(图六,16)。

盆 1件。敞口,翻沿,尖唇外突,弧腹,平底微内凹。内底螺旋纹。标本D1Q2:10:口径10.8、底径6.8、高3.8厘米(图六,17)。

器盖 1件。圆饼形,绳纹桥形纽,内面螺旋纹。标本M8:7:直径10、高1.1、纽高0.3厘米(图六,18)。

## (2) 印纹硬陶

罐 1件。直口,方唇,沿内斜,深弧腹,平底微内凹。腹部拍印直角相交席纹。标本采3:口径17.6、底径12.6、高20.4厘米(图七,1)。

瓮 1件。直口微侈,束颈,圆鼓腹,圈底近平。沿面三道凹弦纹,颈部数道粗凸弦纹,腹部和底部拍印云雷纹,线条细浅、布局杂乱。标本采5:口径13.2、腹径25.2、底径24.4厘米(图七,2)。

甗 9件。分A、B、C三型。

A型 2件。口近直,短颈,弧腹,平底微内凹,底边切削痕已抹光。标本采1:腹部拍印大方格填线纹,颈肩抹光一周。口径12、底径12、高10.4厘米(图七,3;彩版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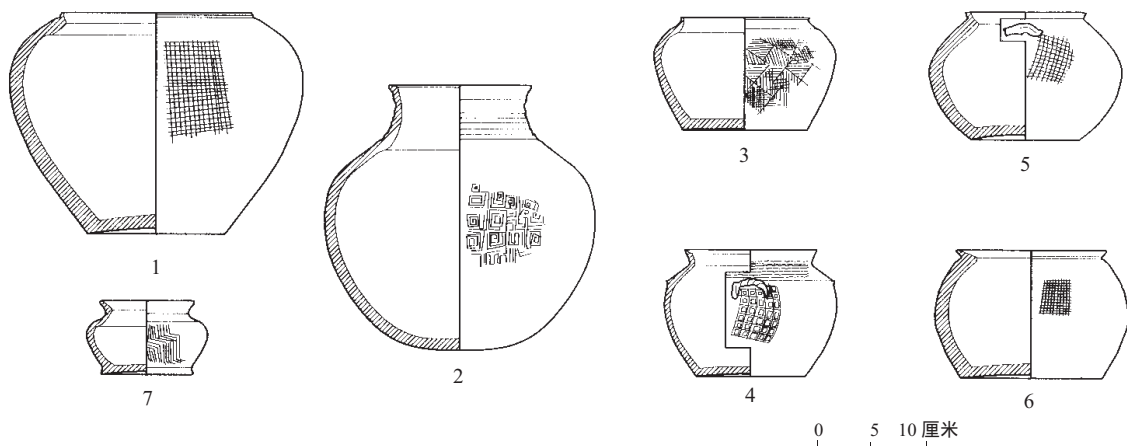
B型 4件。敞口,沿内弧,束颈,双耳,弧腹,平底微内凹,底边有清晰切削痕迹。分二式:

式 2件。肩腹间有一周突棱。标本D1Q3:5。横向双绳索状耳,肩部拍印水波纹,腹部拍印回字纹。口径12.2、底径10.2、高11.7厘米(图七,4)。

式 2件。肩腹间无突棱。标本M10:1。横向双桥形耳,腹部直角相交席纹。口径11.2、底径11、高11.8厘米(图七,5)。

C型 3件。宽折沿,束颈,扁弧腹,大平底微内凹。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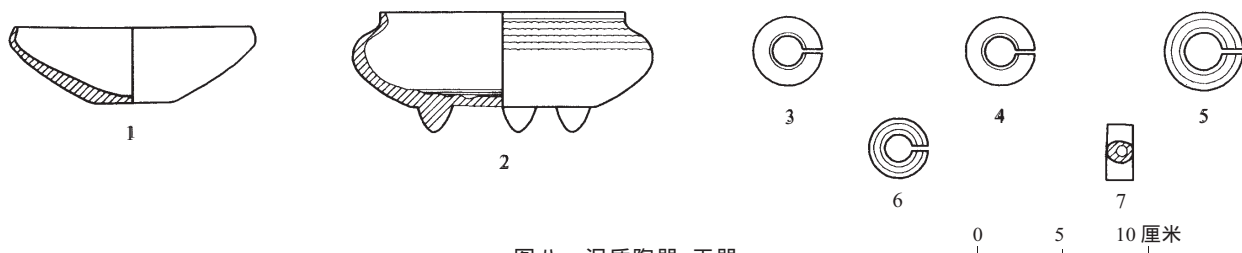
式 2件。底边切削痕经过抹光。标本D1Q2:8。腹部拍印直角相交席纹。口径13.9、底径12.6、高11.8厘米(图



图七 印纹硬陶器物

1. 罐(采:3) 2. 瓮(采:5) 3. A型甗(采:1) 4. B型甗(D1Q3:5) 5. B型甗(M10:1) 6. C型甗(D1Q2:8) 7. C型甗(采:4)





图八 泥质陶器、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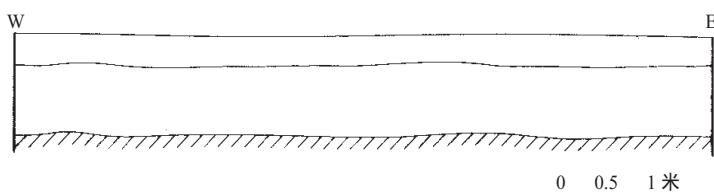
1. 陶钵(D1Q2:13) 2. 陶炉(M9:16) 3. 玉块(D1Q4:1) 4. 玉块(D1Q4:2) 5. 玉块(D1Q4:4) 6. 玉块(D1Q4:5) 7. 玉管(D1Q4:3) 七,6;彩版二,4)。

式 1 件。标本采 4 底边可见手捏裙边,腹部拍印折线纹。口径 8.8、底径 8.5、高 6.8 厘米(图七,7)。

### (3) 泥质灰陶

钵 1 件。敛口,圆唇,腹斜收,小平底。胎色灰黑,胎质疏松。标本 D1Q2:13:口径 13.9、底径 4.5、高 4.5 厘米(图八,1)。

三足炉 1 件。直口微侈,圆唇,鼓腹,平底贴筑三足。肩部和上腹部刻划平行波浪线。胎色浅红,胎质疏松。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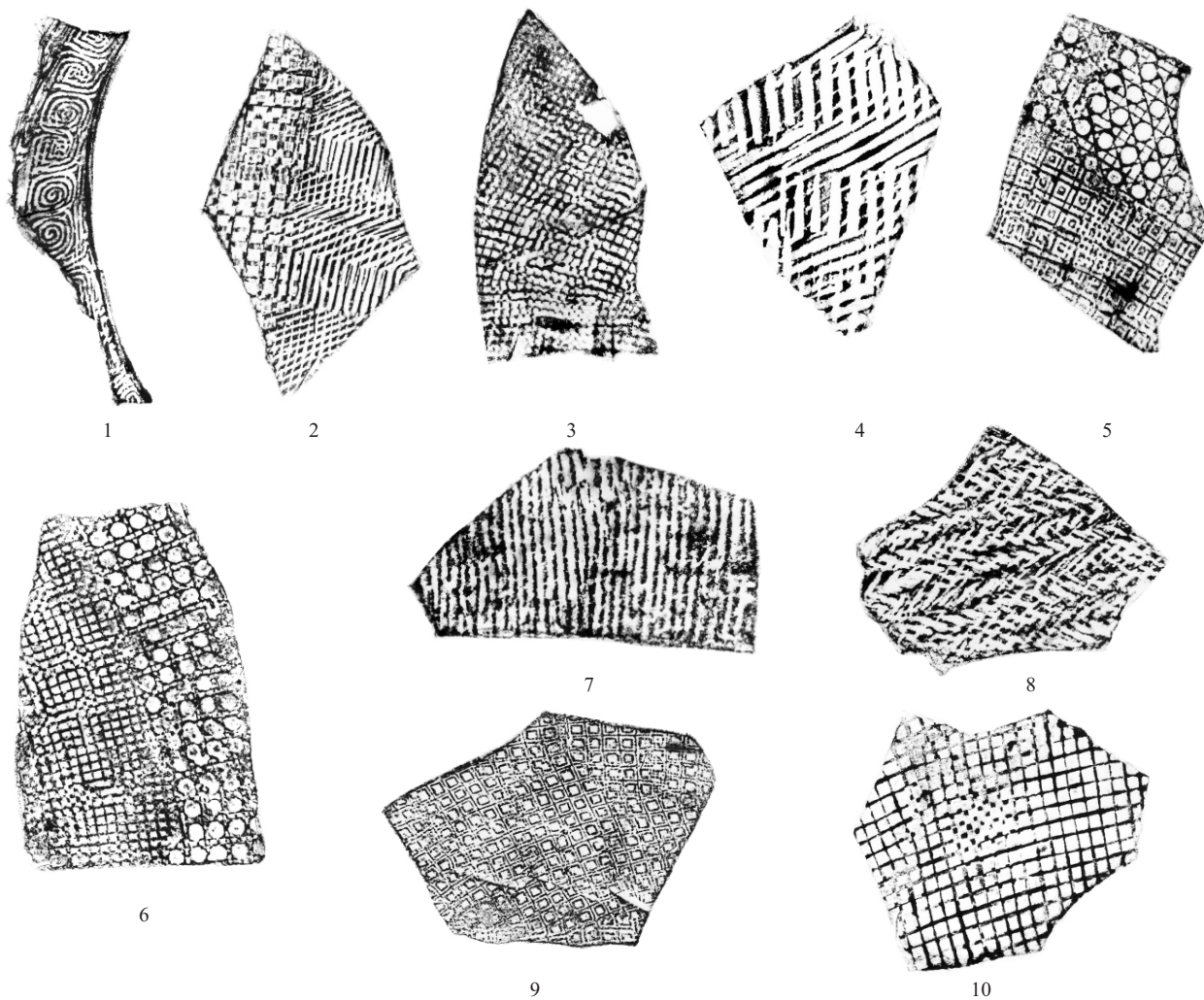


图九 T1 北壁地层剖面图

M9:16:口径 14.5、底径 11、高 7.1 厘米(图八,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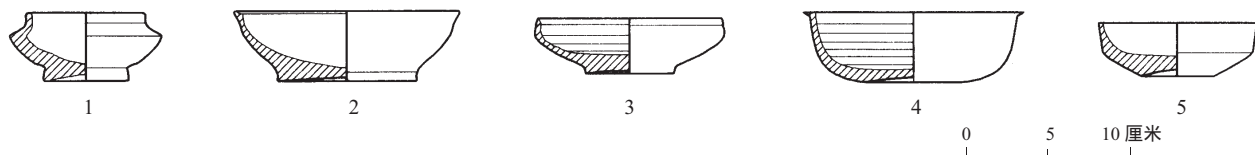
### (4) 玉器

玉块 4 件。正面有突棱,背面扁平。标本 D1Q4:1 外



图一〇 部分纹饰拓片

1. 云雷纹 2. 折线+回纹 3. 小方格纹 4. 折线纹 5. 回纹+方格+圆圈纹 6. 方格+圆圈纹 7. 弦纹 8. 绳纹 9. 回纹 10. 方格纹



图一— 商周遗址出土器物

1. 豆(T1 :1) 2. 碗(T1 :2) 3. 钵(T2 :1) 4. 钵(T3 :1) 5. 钵(T4 :1)

径 4.1、内径 1.8、厚 0.8 厘米 ;标本 D1Q4 2 :外径 4.1、内径 1.8、厚 0.8 厘米 ;标本 D1Q4 4 :外径 4.6、内径 2.2、厚 0.5 厘米 ;标本 D1Q4 5 :外径 3.8、内径 1.6、厚 0.5 厘米(图八,3~6;彩版二,3)。

玉管 1 件。不规整圆柱状,中空。标本 D1Q4 3 :上内径 0.6、上外径 1.5,下内径 0.7、下外径 1.6,高 4.6 厘米(图八,7)。

## 二、遗 址

位于卢家山东侧约 200 米处的农田中。发掘时共布 5×7 米探方 4 个,发掘面积 140 平方米,出土一批商周时期文物标本。

### 1. 地层堆积

遗址地层比较单薄,现代耕土层下即为商周文化堆积。现以 T1 北壁剖面为例说明(图九):

第①层 现代耕土层,厚约 25~30 厘米。

第②层 深约 90~100 厘米,厚约 60~75 厘米。灰黄色黏土,土质致密。出土遗物主要有商周时期的陶瓷残片。

②层下即为生土层,青灰色淤泥,土质纯净。

### 2. 出土遗物

遗物均出自第②层中,主要器类见有原始青瓷豆、碗、钵,印纹硬陶碗、罐,泥质陶罐、豆、钵、器流以及夹砂陶鼎(鬲)足等,其中可复原标本 5 件,均为原始瓷。器物表面纹饰丰富,有纹饰者占全部出土遗物的 41.3%。纹样主要有绳纹、席纹、弦纹、回纹、水波纹、叶脉纹、折线纹、戳点纹、方格纹、斜格纹以及方格纹与折线纹、方格纹与叶脉纹、方格纹与圆圈纹、叶脉纹与圆圈纹、回纹与云雷纹、回纹与折线纹、斜格纹与戳点纹、弦纹与云雷纹、回纹与方格纹及圆圈纹等组合纹饰。这些纹饰大多拍印于硬陶和泥质陶器表,原始瓷上仅见弦纹、水波纹和斜格纹与戳点纹组合,夹砂陶上仅见绳纹一种(图一〇)。

5 件可复原标本包括原始瓷豆 1 件、碗 1 件、钵 3 件。简述如下:

豆 1 件。圆唇,折弧腹,浅喇叭形矮豆把。胎体厚重,釉层厚薄不均,有滴釉现象,釉不及底。标本 T1②:1 :口径 7.2、底径 5.1、高 4.1 厘米(图一一,1)。

碗 1 件。敞口,侈沿下凹,弧腹,假圈足,外底有砂粒。胎体厚重,釉不及底。标本 T1②:2 :口径 13.6、底径 8.5、高 4.2 厘米(图一一,2)。

钵 3 件。标本 T2②:1 :敛口,尖唇,上腹外鼓,下腹斜收,平底微内凹。器形规整匀称,内壁饰螺旋纹。满施青釉。口径 11.2、底径 5.4、高 3.3 厘米(图一一,3);标本 T3②:1 :

侈口,宽平沿外突,尖唇,深弧腹,平底微内凹。内壁饰螺旋纹。胎体粗糙,釉层剥落。口径 13.4、底径 6、高 4.2 厘米(图一一,4);标本 T4②:1 :侈口,圆唇,折腹,平底内凹。灰胎。釉不及底。口径 9.6、底径 4.4、高 3.2 厘米(图一一,5)。

## 三、结 语

浙江地区土墩与土墩石室墓的发掘与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sup>②</sup>,当时在江山地区清理了可以判断为土墩墓的 30 组器物<sup>③</sup>;八、九十年代,在上虞严村、白马湖畔、羊山、湖州杨家埠、堂子山、德清三合塔山、独仓山与南王山、长兴便山、石狮、淳安左口、慈溪杨梅山、彭东与东安等地又陆续发掘了一批土墩与土墩石室墓葬,并据此确立了浙江地区土墩墓的编年序列<sup>④</sup>。这为我们确定卢家山商周遗存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尺。

卢家山发掘的 5 座土墩石室墓中,M7 和 M9 随葬品均以原始瓷豆为主,这些原始瓷豆多为浅喇叭形矮豆把,厚胎厚釉,釉色较深,釉层厚薄不匀,有滴釉现象,部分器物外底还见有刻画符号,纹饰多见“∞”形堆贴纹、戳印纹、弦纹、绳索状附加堆纹等,这些特征与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之第五期典型器物特征一致<sup>⑤</sup>,据此,M7 和 M9 的年代可定为西周晚至春秋初期。M8 随葬的原始瓷盅式碗与慈溪彭东、东安土墩石室墓五、六期中的 式原始瓷盅式碗<sup>⑥</sup>,长兴便山第五期土墩石室墓中的 式原始瓷盅式碗<sup>⑦</sup>以及上虞羊山古墓群出土的原始瓷盅式碗(D3:5)<sup>⑧</sup>等特征一致,据此,M8 年代可定为春秋晚期。M10 被 M8 打破,年代应较 M8 为早,其随葬的 A 型 式原始瓷盅式碗与长兴便山第四期土墩石室墓中的 式原始瓷盅式碗、长兴石狮第三期土墩墓 D2M11 的 A 型 式碗<sup>⑨</sup>特征一致,据此,M10 年代可定为春秋中期。M4 出土器物时代特征不明显,但其所出钵与 M9 所出钵同属 B 型,据此可大致推断 M4 的年代应为西周晚至春秋初期。

卢家山 D1 发现的 4 组器物群中,Q2 出土的 3 件印纹硬陶甗中有 2 件已出现对底边的切削痕进行抹光的现象,这与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之第六期甗的底边作法一致,但其出土的 3 件 A 型 式原始瓷碗特征属春秋中期,故 Q2 年代可定为春秋中期。Q1 仅出土 1 件原始瓷罐和 1 件原始瓷盅,其中瓷罐与 Q2 所出罐型式相同,且 Q1 和 Q2 均位于 D1 第②层下,故 Q1 年代亦可定为春秋中期。Q3 出土的 B 型碗与长兴石狮第二期土墩墓 A 型 式碗(D4M6 :16)特征一致,出土的甗底边清晰地保留有切削痕迹,故 Q3 时代可定为西周晚至春秋初期。Q4 与 Q3 均位于 D1 第③层下,初步推断 Q4 亦为西周晚至春秋初期遗存。

卢家山东侧农田中发现的遗址出土器物以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为主,其原始瓷豆(T1②:1)与其西侧土墩石室墓所出C型式豆相近,瓷碗(T1②:2)与D1Q3所出B型碗相近,瓷钵T2②:1和T3②:1分别与土墩石室墓及D1Q2所出C型钵和A型钵相同,据此可以断定该遗址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这与卢家山上发现的商周遗存时代大体一致。但该遗址文化堆积单薄,在发掘探方周边进行的考古勘探结果显示该遗址的分布范围也十分有限,总面积不超过200平方米,堆积如此单薄且规模不大的遗址与卢家山上发现的内涵丰富、数量较多的土墩石室墓葬及器物群相比无疑悬殊甚大,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如何尚待进一步探讨。

参加此次勘探发掘和资料整理的有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结华、林国聪、刘志远,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技工翁进有、李明清,山东省聊城市文物局技工刘文平、孙贵洪,河南省洛阳市文物钻探队技工张留军、张振东等人。资料整理林国聪、王光远、张华琴;工地绘图翁进有、刘志远;电脑制图王光远;摄影林国聪、王光远;文物修复翁进有;考古领队王结华。

执笔:林国聪、王光远、张华琴

(上接第78页)

隔具,只有筒形、覆钵形、覆盆锯齿形等垫具以及垫片,其中较为矮小的覆钵形、覆盆锯齿形垫具多见于窑室前中段,相对较高的筒形垫具多见于窑室后段。锯齿状垫具的使用增加了与窑底砂层的附着力,垫具多在腰腹部设有小孔,有利于火焰的流通,窑具旁发现的垫片,应为窑具平衡的辅助设施。窑室内各个部位均见有窑具残留,表明装烧时该窑各段都已充分利用,装烧容量得到提高。

### 3. 关于老虎岩窑的制作工艺

老虎岩窑出土器物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大件的罐、缸、盆和坛等粗大容器。器物胎土虽属瓷土,但含砂较多,淘洗较差,杂质多,气孔多,瓷坯炼制不精,质地疏松。器物胎体没有完全烧结,吸水率和显气孔率都比较高,制作工艺比较原始。器物成形有拉坯成形和泥条盘筑两种,以后者为主,器型相对比较工整,口沿部分多用轮制修整,内外壁见有五齿工具刮刷痕迹。釉属于灰釉,含铁量高,质粗,釉色呈酱色、黄褐色等,普遍采用局部刷釉,釉多在器物口沿内外,釉层薄,不均匀,因此烧成后浓淡不匀,色调不一,有聚釉现象。部分大型器物如缸等因窑温不均有生烧现象。器物表面多无装饰,但在部分覆盆锯齿形窑具上发现有刻划符号和文字,可能是窑工的姓氏或其所制作的标记。

### 4. 关于老虎岩窑的使用时代

老虎岩发现的两座窑址彼此相距不远,窑的形制结构、砌筑方法及其长度、宽度、坡度、方向等都基本相同,窑室内出土的器物 and 窑具也完全一样,应为同一时期建造。窑址废品堆积不厚,几无层位可分,且堆积中器物碎片不多,说明

注释:

①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洪塘卢家山六朝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②、④、⑤ 陈元甫:《论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江山县文管会:《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彭东、东安的土墩墓与土石室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便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⑧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羊山古墓群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石狮子墩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老虎岩窑烧造延续时间不长。从出土窑具上看,老虎岩窑所出覆钵形、筒形窑具在宁波地区其他一些烧制原始瓷器的东汉晚期窑址中普遍有发现<sup>②</sup>,覆盆锯齿形窑具和奉化山头朱东汉晚期窑址中发现的锯齿形窑具一样<sup>③</sup>;从出土器物上看,老虎岩窑所出器物以大件实用器为主,器物造型、器表装饰、制作方法及其胎釉工艺等也都大体符合东汉时期原始瓷器的特征<sup>④</sup>。据此,我们初步推断老虎岩窑的使用时代应为东汉晚期。

参加此次发掘和资料整理的有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永宁、罗鹏,陕西省宝鸡市文物局技工彭海元等人。工地绘图彭海元,电子制图林国聪、雷少;器物修复范信伟;拓片刘文平;摄影吴东清;考古领队李永宁。

执笔:李永宁

注释:

① 郑嘉励:《三国西晋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工艺及相关问题——以上虞尼姑婆山窑址为例》,《东方博物》第三十五辑。

② 林士民:《浙江宁波汉代窑址的勘察》,《考古》1986年第9期。

③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④ a.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修订本),第231~2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b. 王结华、毛颖、刘丽文著:《古越遗珍研究》,第155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本期导读

按:“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浙江省东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宁波,既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又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和古代著名的对外交通贸易口岸。在漫长的岁月旅程中,生活在这片美丽沃饶土地上的宁波先民,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精神财富和物质遗存,这些凝聚着先民勤劳智慧的历史文化蕴藏,不仅为宁波地域考古的发端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同时也为宁波地域考古的拓进勾画出了广阔充分的发展空间。

宁波地域考古肇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宁波地域考古工作开始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重视,考古成果从无到有,积少成多,考古力量也由弱渐强,逐步壮大。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间,发生在宁波地域的正式考古发掘项目计有120余项,涉及遗址、墓葬、窑址、城址等多种文化遗存类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发展格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80年代天封塔地宫与塔基、唐宋明州子城遗址,80年代上林湖低头岭窑址与寺龙口窑址,新世纪初永丰库遗址、田螺山遗址、傅家山遗址、郭童岙窑址和句章故城城址等重点项目的调查发掘,在业界内外均引发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寺龙口越窑遗址与元代永丰库遗址的发掘,还分别被评为1998年度和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河姆渡、田螺山、傅家山、上林湖、郭童岙、天封塔、天宁寺、水则亭、永丰库、孔庙、和义门瓮城、渔浦门码头、句章故城等一些重要的考古成果在发掘后,或辟为博物馆、现场馆和遗址公园,或得到了很好的原址保护,成为宁波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瑰宝与灵魂。

回顾过去,为的是展望未来。今后的宁波考古工作,如何依托本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和城市坚实的物质支撑,在致力开辟新的考古领域,努力拓展新的考古空间,完善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质量的同时,更需要切实改进考古成果转化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的现实状况,逐步规范考古项目资料整理,不断加大考古成果研究力度,将具体零散的考古材料转化为社会共享的信息资源,充分发挥其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积极作用。与科学出版社合作的业已展开的“宁波文物考古研究丛书”的组织出版,以及与《南方文物》合作的即将实施的“宁波考古专栏”的陆续推出,正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次有益探索与尝试。

(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结华)

### 一、《浙江宁波洪塘卢家山商周遗存发掘报告》

从以往的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浙江地区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的发掘与研究由来已久,尤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先生所著《论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最为系统,并确立了浙江地区土墩墓的编年序列,为今后的发掘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这在本文作者的结语部分中得到了较多的体现。

洪塘卢家山西周至春秋遗存的考古发掘,共计发掘了土墩石室墓5座、土墩墓1座及一处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墓葬中出土物达91件,以原始瓷最多,占比达80%多,器形见有豆、钵、碗、盅、罐、盂、盆、器盖等;遗址中出土的多为商周时期的遗物标本,其中可复原的器形有原始瓷豆、碗、钵等,上述遗存的发掘与发现,应该说是充实和丰富了浙江地区土墩墓的资料。该篇



报告作者在对相关遗存的年代判断方面下了比较多的功夫,在墓葬方面,通过器物类型的比较确定了 M7、9 的年代为西周晚至春秋早期,M8 为春秋晚期。在判断 M10 年代方面,作者首先根据 M10 被 M8 打破的地层关系,确定了在相对年代上 M10 早于 M8,加之 M10 所出器物 A 型原始瓷盅式碗与长兴便山、石狮所出春秋中期同类型器物一致,据此判定其年代为春秋中期。尽管 M4 出土器物时代特征不明显,但其所出的钵与 M9 一致,故也可以推断其年代应为西周晚至春秋初期。同理,土墩墓(D1)中的 4 组器物群(Q1~4)的年代也逐一得到了推断(详见报告)。至于商周文化堆积的时代判断,通过对其所出标本与上述墓葬所出器物比较,也可以断定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从理论上说,在如此相近的地方既有文化堆积层,又有墓葬群分布,且时代又大体一致,它们之间似乎应该存在某种联系的,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如何,我们寄希望于在今后的调查和勘探工作中能有所发现和突破。

## 二、《浙江奉化茗山前汉晋墓葬发掘简报》

茗山前共计发掘的 4 座墓(M1~4),M1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2 为凸字形单砖室券顶墓,M3、4 为长方形单砖室券顶墓,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晚期的盗扰及破坏,其中 M3、4 未发现任何随葬器物。尽管这几座墓葬均未见明确的纪年材料,但由于 M1、2 出土的 9 件随葬器物以实用器为主,时代特征明显,作者通过参照长江下游地区两汉、吴、西晋墓葬分期研究的成果,并通过器物类型的比较,得出了上述四座墓葬的基本年代判断,笔者认为基本可靠的,为同时期的墓葬研究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 三、《浙江宁波鄞州栎斜老虎岩窑址发掘简报》

粗看该简报,感觉老虎岩窑好像并没有引起我们多大兴趣,该窑址窑业堆积不厚,生产品种单一,器物制作工艺简单,主要是罐、缸、盆和坛等粗大容器,器物的胎土虽属瓷质,但淘练不精,质地疏松。但细读之下,有几处笔者认为值得重视的地方,一是老虎岩窑址发现的两座龙窑,虽然窑顶已毁,但工作人员在窑室的两侧每隔 5~6 米发现有青色火烧堆积,证明了当时窑顶应有投柴孔。二是作者对老虎岩窑的烧造技术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各类垫具在如何使用上作了详细的说明,这在以往类似的简报和报告中往往会被疏忽。三是对窑具上的文字和符号进行了梳理,此类信息在多数窑址的发掘报告中均有描述,在性质上这些文字和符号包括了姓氏、地名、数码顺序、方位、花押款等类,从中可反映产品的性质、生产工艺的特征、生产和销售的方式等内容,是探讨瓷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浙江宁波天封塔基址发掘报告》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文物》1991 年第 6 期上发表的《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今天我们又看到了本文,也算是对该塔的发掘作了一个圆满的结束。在我们对地宫中所出的精美器物赞叹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塔基发掘的意义和作用。通过对塔基的详细发掘和解剖,再付诸于文字记录并以报告的形式予以发表,至少解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了现存天封塔的建造年代应属宋塔而非唐塔,也并非在唐塔基础之上重建的,既印证了文献的记载,也纠正某些错误的认识。二是树立了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的筑基理念。由于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地脉虚软,建塔的工匠们没有生搬硬套《营造法式》,而是因地制宜,独创了换土垫层、隔层用材、侧脚立基的筑基之术。三是通过对塔身倾斜的原因探讨,为今后类似建筑的加固和重修无疑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编者按:本期“两重两利,文明重光”栏目得到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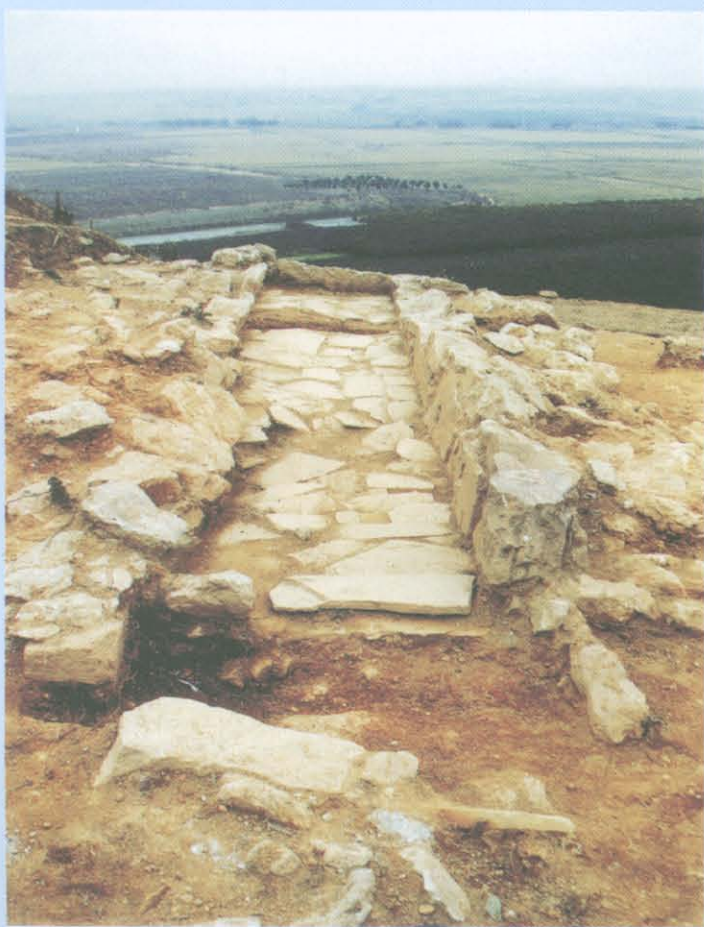
## 浙江宁波洪塘卢家山商周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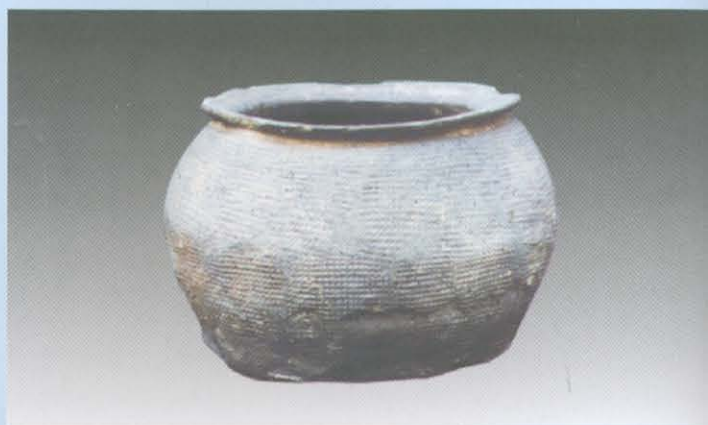
1



3. 玉玦(DIQ4: 1、DIQ4: 2)



2



4. CⅠ式甗(DIQ2-8)



5. A型甗(采:1)



6. CⅠ式豆(M9:25)



7. AⅡ式碗(M8:2)



8. B型盅(M4:3)